



【社会观察】

考生眼里出名校

□雨茂

考学就像找对象,知己知彼,务实选择,两情相悦最重要,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情人眼里出西施,考生眼里出名校。

到北京大学参加培训,上课的地点就在紧靠西门的燕园中,每天都看到大量中小学生排队参观北大校园,进不了校园的就在西门外的匾额下面拍照,还听到一些老师、家长鼓励孩子将来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门口同样人声鼎沸,人流如织,如果没有清华的证件,进入校园相当不容易。北大、清华门口甚至有所谓的黄牛党声称交钱就可以带人入校参观,不用长时间排队,而邻近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基本看不到如此盛况。其实,这两所学校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很有限,甚至比不上一些地方高校的招生人数,全国的学生都眼巴巴瞅着这两所学校,每年如愿的能有几人?

什么是名校,应该是见仁见智,如今却被简单化了。对于境外名校,主要看国际排名,尤其是所谓的权威排名,进入全球排名前列的就是“名校”。有人指出,排名也可以作假,有些学校为了提高或者保住排位,专门安排人研究排名规则,处心积虑地精巧应对。国内主要看是不是政府认定的985高校,985高校内部则看是不是九校联盟(C9)学校,C9高校内部则看是不是最牛的北大与清华。与之对应的是各省市四星级以上高中都把考入这两所学校的人数作为重要的宣传噱头,放在红榜前头的永远是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

如果从社会评价的层面看,名校之有名本不在所谓的权威排名,也不在政府扶持与认可,而在于毕业生。没有大量知名校友,就没有所谓名校。这就好比名人,主要是看他(她)取得的成就,而不是媒体曝光率。白岩松讲过一个笑话,意思是一只狗牵到中央电视台都能变成名狗,但人们不会真心认可。就像一些浅薄的网红,只有无知的人才认为

他们是名人。相反,人们对袁隆平、莫言、马云的名人地位就没有异议,成绩在那里摆着,不满的人可以比照看看,估计自惭形秽的人居多。无论是袁隆平还是马云,都不是名校毕业生,相反,母校反而以他们为荣,靠他们扬名。莫言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途辍学,连中学都没有上过,何谈考大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并不因为莫言没有上过名校而拒绝授予荣誉,人们也不会因此而低看莫言的文学成就。从另一个方面看,有了名校友就能称名校吗?未必尽然。比如我校是一所省部共建的师范大学,在本省的教育界早就打出了名头,但到了外省,了解的人并不多,今年招生咨询,工作人员就向考生宣传李琦,因为他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全国总冠军。其实大家都明白,除非学习流行音乐,奔着李琦去的考生是极少的。那么,到底何谓名校呢?窃以为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名校之有名,是历史形成的,与现实的关联反而不大,如果躺在历史功劳簿上当啃老族,终究会被诟病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名扬天下,因为它培养了160多名两院院士,还出了两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海峡两岸的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联大的毕业生大多是翘楚,在各行业大都是领军的旗帜性人物。如今的中国大学却遭遇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对大学发难的岂止钱学森先生,在一片质疑声中,无论是985还是211高校,谁还好意思自诩为名校?

其次,名校之有名,在于专业,在于有一批敬业渊博的学者,有一大批业界精英。立志做医生的,心仪的医学院校就是名校;甘心做教师的,憧憬的师

范院校就是名校;怀揣财富梦想的,神往的财经学院就是名校……在各高校的毕业生中如果有考生仰慕的偶像,考生报考的意愿一定是坚如磐石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学生奔着学校的名头却不考虑专业,别别扭扭上了四年大学,最后甚至抱憾终身的。还有考入名校觉得不合适却转入一般学校就读的。对于立志考名校的中学生来说,应该引以为鉴。

最后,名校也有层次,并不只属于少数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发愿做学问的,重点大学当然是名校;期望做职业人士的,各类专门大学都可能成为他们心中的名校;立志做灰领的,职业技术学院中就有名校;情愿做技术工人的,种类繁多的中职技校之中,一定有被社会广泛认可、被业界认同的名校。家长不能囿于面子思想,而要思考谋划孩子将来的发展,应该考虑到孩子的兴趣,同时顾及社会需求。学生也不能好高骛远,要思考今后如何在社会立足,怎样做选择才更有利于安身立命等。总的来说,考学就像找对象,知己知彼,务实选择,两情相悦最重要,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情人眼里出西施,考生眼里出名校。

至于一般人眼中的名校都是研究型大学,深究起来也是有原因的。一是长期科举制度的影响,学而优则仕,英雄也问出身;二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学历崇拜,毕业于重点大学就预示着前途光明,学历高就意味着收入高、升迁快;三是家长、考生的虚荣心作祟,别人的孩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的孩子考不上多丢人呀!考生当然也这样想。

当学校凭众多杰出校友扬名,考生也以社会认可、行业公认确定心中的名校时,名校也许才真正算是实至名归。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窥海斋】

之于村上的鲍勃·迪伦:『我们都将年老』

□林少华

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揭晓,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意外获奖,文学写手村上春树意外没获奖。这个结果倒是印证了村上文学的一个主题:人世间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以至荒谬性,充满幽默式反讽或反讽式幽默。

村上对鲍勃·迪伦绝不陌生。比如他在即使获诺奖也毫不令人意外的长篇杰作《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一再提及迪伦:“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我们都将年老,这同下雨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

我也不再考虑革命,随着村上考虑年老——“我们都将年老”。“我们”指谁?想必首先指鲍勃·迪伦和主人公“我”或村上本人。鲍勃·迪伦1941年降生,今年七十五岁,老了。老了的迪伦没白老,得了诺奖,老有所得,可喜可贺!村上1949年来到人世,也老了,六十七。老到七十五岁时没准也能拿得诺奖。“我们”的另外所指,应该是泛指了,指所有的你我他——“我们都将年老”。

不过总的说来,村上的小说很少写老,主人公一般不超过四十岁,超过三十的都很少。他有一部短篇《游泳池畔》(收于短篇集《旋转木马磨盘记》)倒是专门写老,可主人公才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主人公假定自己活到七十岁,turning point(转折点)即三十五岁——“至此已过完一半”。于是主人公“我”彻底脱光衣服,在大镜子前仔细检查已进入转折点另一侧的自家身体:“由于运动和计划性饮食,腹部比三年前明显收敛了,就三十五岁而言成绩相当不俗。然而侧腹至背部的赘肉却是半生不熟的运动所难以消除的。横向看去,学生时代那宛如刀削的腰背直线已杳无踪影。阳具倒没什么变化,比之过去,作为整体诚然少了几分生猛,但也有可能是神经过敏的关系……但他慎之又慎的目光绝没看漏缓缓爬上自家身体的宿命式衰老的阴影。”如此这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正在变老”。主人公随即感叹:再怎么挣扎,人也是无法抗拒衰老的。和虫牙是一回事。努力可以推迟其恶化,问题是再怎么推迟,衰老也还是要带走它应该带走的部分。人的生命便是这样编排的。年龄越大,能够得到的较之所付努力就越少,不久变为零。

我的三十五岁呢?也巧,我三十五岁那年正在主人公“我”或村上所在的日本。三个中国留学生合租大阪市住吉区一座日式平房,一人一个房间,除了天花板和榻榻米几乎一无所有,借用村上的俏皮话,整洁得活像太平间。没有大镜子,一年间几乎忘了自己长什么样。也没什么钱去游泳池。一星期才去一次日语叫“御钱汤”的大澡堂,不得不在前台一个风韵犹存的老板娘面前脱得光光的,洗完赶紧在老板娘面前提上裤子落荒而逃,汗都出来了,哪有心思在大镜子——大镜子那里倒是有——面前上上下下仔细检查身体所有物件呢?那就是三十五岁时的我。你说这日本也真是的,老板娘的丈夫干什么去了?何苦偏让三十五岁和非三十五岁个个老大不小的中日男性在自己老婆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安的什么心?

一晃三十年过去,如今正向六十五岁进军。自家有洗澡的空间了,没有在日本“御钱汤”女老板面前脱光亮相的尴尬了。可惜年老随之而至。即使长命百岁,不,就算百岁外再奖给二十岁,六十五也足以是转折点了。意识到也罢没意识到也罢,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都必须面对一个难以撼动的事实:我正在变老。No,我已年老!人家迪伦七十五岁拿了诺奖,自己七十五岁时这种可能性无疑是零;村上六十五岁时已“陪跑”好几年,而自己连“陪跑”的资格都没有。“陪跑”的“陪跑”?非得!

偶有年轻人羡慕我的年老,尤其羡慕我即将告老还乡:老了好好啊!没有房贷,没有“国考”,没有小孩入托,没有“小三”干扰,没有……果真?不是寻我开心?别急,甭急,不用急。老是每个人必然参与的一个节目。哪怕再风流倜傥,也总要步履蹒跚;哪怕再花容月貌,也总要满脸皱纹;哪怕再像一块滚石,也总有一天化为泥土;哪怕再迪伦、再村上,也总要被时间平等地掀翻在地。但另一方面,假如没有老,没有老的最后一步,人世间恐怕也就没了哲学,没了文学,没了神学,没了艺术,没了信仰和理想。幸而,“我们都将年老”,这和我们绝大部分人同诺奖无缘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

但不明白的地方也是有的:村上为什么听了鲍勃·迪伦唱的《像一块滚石》就不考虑革命而考虑我们都将年老了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